

《世界通史》选编

英法德俄历史

1830—1917

下 册

《世界通史》选编

英法德俄历史

1830—1917

下 册

商务印书馆

1972年·北京

第十六章

改革以后的俄国

农奴制度的崩溃在俄国的历史中开始了一个新时期。在封建主义内部早已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现在为自己的增长得到了更广阔无比的余地。但是，在 1861 年资产阶级改革以后，农奴制度也还留下颇多的残余，它们给沙皇俄国此后的一切社会经济发展盖上了自己的烙印。

1. 农奴制度崩溃以后俄国 社会经济的发展

农奴制度的残余和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 俄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国家。根据 1877 年的土地普查资料，7,300 万俄亩——全部私有土地的 $\frac{3}{4}$ ，强在贵族的手中；这种土地的巨大的和良好的部分是人数不多的一群大庄园所有者的财产。约 3,000 万俄亩的土地属于仅仅一千个大地主。

贵族土地所有制的统治地位同农民的极度缺乏土地结合到一起，农民在“解放”时被掠夺，并受赎金和赋税的沉重压迫。农民在经济上依附地主，地主广泛地使用奴役制的、半农奴制的剥削方式。作为对租佃地主的一小块土地、对所借贷的粮食或金钱的报酬，农民们用自己的原始农具和疲惫不堪的役畜去耕种老爷的田地。这种以“工役制”的名称为人所知的制度，实质上是隐蔽的劳

役租制。到十九世纪 80 年代末,在欧俄 43 个省的 17 个省,特别是在它的人口稠密和农民开垦最盛的黑土中心,工役制占有优势。

农奴制度的残余摧毁了农民经济的生产力。农民田地的单位面积产量依然极低。在这些条件下,歉收是经常的现象,它们的同伴——农民的饥饿也是一样。从十九世纪 70 年代末起,俄国进入了慢性的农业危机时期。危机的一切重力都落到农民身上,他们为了向地主和国库付清款项,不得不以明明知道吃亏的价钱在市场上出售粮食。同时,工役制的规模增大了,租佃条件恶化了。

农奴制的残余无论怎样沉重,它们只能推迟资本主义渗入农业的时间。甚至在大领地中,大部分土地上的奴役性佃租和工役制,往往同其余土地上的“合理的”、企业性经济的体制结合起来。地主们在自己的庄园里开设酿酒厂和制糖厂,购置改进的机器,招募雇农作工。

在农村,依靠“清洗”中农,分化出人数不多的农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化的贫民群众——持有份地的农业工人阶级。村社土地的平均使用(定期重分份地)掩盖了村社内部增长的不平等。贫农越来越常常丢掉自己的份地,把它们租给富农。富农依靠向地主收购或租佃而增多自己的田园。在十九世纪 80 年代,富裕农户(约占农村人口的 $\frac{1}{5}$)就集中了所有农民使用的土地的 34% 到 50% (各省不同),而占农村人口半数的贫农,只拥有 19% 到 32% 的土地。

不错,旧的、宗法制的农民阶级的解体,在俄国远远没有立即具有明显的、发达的形式。农民的群众性的贫穷化、赤贫化,用列宁的话来说,掩盖了农村资产阶级的开步走^①。但是,在民间得到“农民分家”的恰当名称的农村社会分化的这一苦痛过程,是资本

① 参阅列宁:《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载《列宁全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67 页。

主义不仅在农业中、而且在工业中的增长的最深刻的基础。

农民阶级的分化促进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富裕农民在市场上出售产品的商品部分，不仅购买日用品，而且购买生产资料（改良农具、机器及其他）。依靠自己力量薄弱的经济无法糊口的贫农也到市场上去，用出售自己的劳动力的办法弥补日益增长的开支。

整个说来，俄国的农业越来越具有商业的、企业的性质。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提高了对农产品的需求。由于铁路建设而加深的经济地区的专业化，也促进了耕作业和畜牧业商品性的提高。欧俄在改革后的 40 年间，谷物和土豆的播种面积增加将近一半，而净收获量增加——一倍半。亚麻、甜菜和其他作为工业原料的作物的生产迅速增加。

农奴制崩溃以后，南方各省——过去曾与比萨拉比亚一起构成所谓新俄罗斯的赫尔松涅斯省、塔夫利达省和叶卡德琳诺斯拉夫省，伏尔加河左岸和乌拉尔河沿岸的草原地区（萨马拉省、萨拉托夫省、奥伦堡省），以及后来在前高加索的草原地区，人口密度加强了。在 1863—1897 年间，整个欧俄的人口增加 53%，而南方和东南地区增加 92%。

农民移殖的广泛规模，良好的自然条件，距离黑海和亚速夫海港口近，新的工业基地的产生和同帝国中心建立铁路交通——所有这一切都促进了黑海沿岸、伏尔加河左岸、顿河沿岸的处女草原的开垦和商业性的耕作业的发展。最强烈地袭击了“工役制”省份的农业危机，加速了谷物生产主要中心向南方和东南的转移。在这里，特别强烈地进行了农民阶级解体的过程。残酷剥削当地贫民和外来雇农的农村资产阶级，把贵族地主排挤到次要地位去了。

在比较中部地区和南方、东南方之间的农业发展的特点时，最突出地显示出农业演进的两个基本类型：在第一个情况下——地主的劳役制经济缓慢地发展成伴随着农民群众的破产和一小撮富

农—高利贷者的逐渐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在第二种情况下——农奴制度残余负担最少的农业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在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并存的一切地方，都具有这一种和那一种演进的主要特征。“可见，农业演进的两种潮流到处可以看到。农民同地主的利害冲突，像一条红线贯串着俄国改革后的全部历史……它是争取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农业演进形式的斗争”^①。

大机器工业的增长。新的工业地区 改革后的数十年是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大机器工业取得对小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的决定性胜利。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生产技术迅速地完善起来。在这时候，下列情况具有重大的意义，即：俄国比一系列其他欧洲国家较晚地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能够利用已有的技术经验和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有组织的形式。

列宁写道：“1861年以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这样的迅速，只用数十年的工夫就完成了欧洲某些旧国家整整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转变”^②。这一过程的最特出的指标之一是把蒸汽机应用到工业中。1875—1878年在欧俄的工厂和矿山企业中，蒸汽锅炉和蒸汽机的总功率约10万马力，而到90年代初，它们的总功率已经增长到256,500马力，即在16年间增加了一倍半。

在棉纺织工业中，工厂完全挤掉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以及与它有密切联系的分配制度，也完全挤掉小的农民手工业。在织呢绒、制造食品和其他工业部门中，机器也都代替手工劳动。在冶金业中，搅炼代替了落后的土法炼铁法。在70年代，起初以采用柏

①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载《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21页。

② 列宁：《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载《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4页。

塞麦炉和后来又采用马丁炉为基础的铸钢迅速发展起来。这样一来，在农奴制崩溃以后的二、三十年间，俄国完成了早在改革前时期就已经开始的产业革命。

彼得堡和莫斯科是在俄国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工业的最重要的中心。当时，彼得堡主要是作为机器制造的中心出名，而莫斯科及其周围的工业地区依然是纺织业的主要基地。

过去以不自由的工人强制劳动为基础的乌拉尔采矿冶金工业，在改革后的最初几年，经受了巨大的困难。成千上万摆脱了农奴依附地位的工人离开了工厂。只有经过 10 年以后，乌拉尔的冶金业才达到 1860 年的水平。但是，在后来，它也发展得极为缓慢。

可是，从十九世纪 70 年代起，在国家的南方，开始形成新的采矿和冶金工业地区。建造把莫斯科同顿河岸罗斯托夫联系起来的铁路干线，使顿涅茨的煤得到了出路，颇大地提高了对它的需求。在顿涅茨丘陵地区，开始出现新的矿井。矿井上面的建筑物和圆锥形的矸子山，急剧改变了顿涅茨草原以前的荒漠景观。

1872 年英国资本家休斯在顿巴斯西部建造的工厂中的第一座高炉投入生产，又过两年，俄国资本家帕斯图霍夫在顿巴斯东部建立的苏林冶金工厂出产生铁。两座工场——休斯的和苏林的——当时都是用本地的贫铁矿来工作。自从在 80 年代中期把产煤的顿巴斯同蕴藏着大量丰富铁矿的克里沃罗格地区用铁路连接起来以后，南方的冶金业才开始迅速的高涨。在顿巴斯和克里沃罗日耶之间的半路上，出现了以叶卡德琳诺斯拉夫为中心的德聂伯河流域冶金地区。不知道封建传统的、以较高的技术水平为特点的年轻的南方冶金业，开始迅速地压过古老的乌拉尔。

石油工业是俄国经济中几乎完全新的部门。改革前石油开采微不足道，对石油的需求也不大。在巴库地区，包租制——将油井包租出去一定的时期——的存在，阻碍了石油工业的发展。自

从 1872 年废除这种制度而改为投标长期租赁油田后,巴库周围井架开始增多,在旧城附近出现了一个新的、包围着浓密的烟雾和烟臭的、拥有几十个炼油厂的“黑色城市”。在 20 年间(从 1870 到 1890 年),石油开采量增长了 139 倍,——从 170 万普特增长到 24,200 万普特。俄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卓越发现和发明,扩大了采用石油产品的可能性(用作燃料、润滑油等等)和保证了巴库石油行销世界的市场。在十九世纪末,俄国石油开采量跃居世界第一位,在一时之间压过美国。

铁路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1860 年俄国铁路总长度只有 1,500 公里,1892 年已经有 31,200 公里了。铁路把农业地区同工业地区、边区和中部连接起来,加速了社会分工的过程和全俄市场的增长。同时,铁路是煤和金属、机器和机械的巨大消费者,它促进了重工业的高涨。

在改革后的第一个十年末,俄国进入了加强设立企业、银行、股份公司的时期。在这时候,股份公司的大部分资本不是投入工业,而是投入商业企业、银行事业、特别是铁路建设。在 1873—1875 年的危机时期,在交易所投机倒把的环境中产生的这些股份公司,有许多破了产。

在危机后来临的工业高涨为时很短,被更加严重的 1882—1886 年危机代替了。直到 1887 年起,才又呈现出一些经济的活跃,但是,在 1890—1891 年,一系列的工业部门又陷入停滞状态。国内市场的狭小、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在俄国一直延续到 90 年代中期)的交织、过时的生产方法和组织形式的保存,妨碍着从危机和萧条中摆脱出来。

90 年代的工业高涨。19 世纪末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总结 从 1892—1893 年起,才展开新的工业高涨——在整个资本主义时期最可观的一次高涨。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干线和一系列其他的铁路。

造船的增长、在地主和富农的经济中更广泛地使用机器和农具、工业本身的需要等等，引起了对金属、煤、石油、机车、车厢的加强的需求。生产的增长，特别是在重工业各部门，与其说是用扩充旧企业的方法，不如说依靠建设新企业（主要是在资本主义渗入不久的地区）来进行的。到十九世纪末，南方冶金业生产的生铁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以上，顿巴斯生产的煤占全俄总产量的 $\frac{2}{3}$ 以上；国家的全部石油产量都集中在巴库。

城市迅速地增长了；从 60 年代初到 90 年代末，城市人口增加了 1 倍。大城市的特点是：企业和工人最高度地集中。截至 1897 年，彼得堡的居民达 120 万人（工人及其家属占 40% 强），莫斯科的居民超过了 100 万。敖德萨、基辅、里加、华沙、罗兹、巴库等城市的人口大见增加了。许多工业镇实际上变成了新的工业中心——莫斯科附近的奥列霍沃—祖耶沃，顿巴斯的尤佐夫卡，乌拉尔的下塔吉尔。

在十九世纪最后 33 年间，西伯利亚的俄罗斯族居民增加了 1 倍。随着西伯利亚铁路干线的建成（1897 年修到伊尔库茨克），移民向西伯利亚的涌入量增加了。西伯利亚开始向欧俄供应粮食、肉类、羊毛和油脂，并显示出对工业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新的城市——新尼古拉耶夫斯克、鄂木斯克、托木斯克发展起来，黄金、煤炭和矿石的产量增大了。

大型资本主义工业的增长刺激了银行信贷的发展。商业银行更愿意向工业投资。开始了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的结合。在 90 年代，对俄国工业的外国投资特别增多了：在 1890 年，外国资本在全部股份资本中约占 $\frac{1}{4}$ ，而到 1900 年占 40% 以上。法国和比利时资本占有优势，而德国资本则从它们在 80 年代所占的第一位被排挤到了第三位。

外国资本家不仅购买俄国企业的股票，而且亲自在俄国开办

工厂。英、法、比三国的资本家在顿巴斯、克里沃罗日耶和德聂伯河流域的采矿冶金工业中夺取了主要阵地，英国资本在石油城巴库也安家落户了。外国资本的流入加快了工业的发展速度。但是，当时就已经表现出外国人逞威作福的不良后果：外国人为了追求巨大的红利，用掠夺方式开采俄国最丰富的地下资源，另外，很大一部分利润输送到外国去了。

以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工业新部门，也是俄国最初的垄断组织的策源地。早在 80 年代初期，就出现了大型钢轨轧制厂和桥梁建造厂的所有主之间的卡特尔协定。1887 年产生了糖厂主的辛迪加，到 90 年代初，在这一部门的所有企业中，将近 90% 参加了辛迪加。1893—1894 年组织的炼油厂主辛迪加实际上控制了巴库地区的全部石油开采。不过，这些早期的垄断组织并不稳固，很快就垮台了。

除了大机器工业而外，小商品生产仍然具有自己的意义，而在某些地方显著增长了。俄国幅员广阔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促进了这一点。如果说在一些地区，大工业排挤和吞并了小工业，那末，在另一些地区，特别是在落后的工业部门，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表现于它的最初形式。

虽然工业发展的速度比较高，在农奴制度的残余的重压之下的改革后的俄国，按生产的绝对量来说，仍然落后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而按每人平均的产量来说，就差得更远了。

在欧洲的任何地方，都不像俄国那样鲜明地表现出社会的对比：拥有大工厂、发电站、大建筑物的城市同闭塞的小村庄并列在一起，在那些小村庄里，居民穿着树皮鞋和土布衣服，用祖传的木犁耕地，用镰刀收割成熟的庄稼。国家的巨大天然资源，特别是在西伯利亚，还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利用。甚至在最发达的工业部门中，巨大的生产规模、在当时来说先进的技术设备，也是同最广泛

地利用廉价手工劳动结合在一起的。得到世界公认的俄国科学技术思想的卓越成就,在许多情况下,在俄国本国还没有采用。

经济的农业性质也决定了俄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俄国的进口货是机器、制件和金属,而出口货首先是粮食。到十九世纪末,它是欧洲最大的谷仓,也是木材、亚麻、大麻纤维及其他各种原料的巨大供应者。

俄罗斯帝国各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改革以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是两个相互具有密切联系的过程: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进一步增长和它们向新地区的传播。列宁把第一个过程叫做资本主义向纵深发展,把第二个过程叫做向广阔发展^①。

这两个过程在各民族地区的经济中也表现出来:第一个过程最有力地表现在西部边区,首先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和波兰,第二个过程最有力地表现在高加索和中亚细亚。

波兰王国属于俄罗斯帝国经济最发达的部分。在这里,1863—1864年起义时期所进行的土地改革促进了资本主义比较迅速发展。这次改革保留了地主大地产,而在同时,几乎把农民使用着的全部土地都划归了农民,另外,农民所付的全部地价也比俄罗斯少。波兰的农村中没有村社,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农民的阶级分化进行得很猛烈。在资本主义化的地主和富农农场中,广泛使用了廉价雇佣劳动。同时,保持了规模相当大的对少地农民的奴役性剥削。

农业同市场和加工工业有联系;改革后的时期,供给酿酒业和制糖厂的马铃薯和甜萝卜的生产,以及谷物和畜产品的生产,都大大增加了。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按农业机器和工具的生产 and 消费来说,波兰在帝国中占前列的地位之一。

^① 参阅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5页。

十九世纪末波兰的工业生产中，食品制造和纺织工业仍然占有优势。从 1878 年到 1884 年，纱和布的产值增加将近 1 倍（从 2,100 万卢布增加到 4,100 万卢布）；大部分产品运到俄国内地和东方市场。技术装备良好的罗兹的工厂，很成功地同俄国中部的棉纺织工业竞争。80 年代在莫斯科工厂主的压力下，沙皇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反对罗兹的竞争的措施。后来，这些措施都撤消了，罗兹的工业同俄罗斯市场保持着自己的传统联系。

华沙地区也变成了颇大的工业中心，在那里，有大型的金属加工工厂和机器制造厂，有许多中小型的轻工业企业，有波兰的几乎全部的制糖厂。在索斯诺维采和多姆布罗夫煤田中，采矿和冶金工业发展得特别迅速。波兰的大型制铁企业，正如俄国南部的工厂一样，操纵在外国人的手里（多姆布罗夫的“胡塔·班科夫”冶金工厂属于法国人，索斯诺维采的“叶卡德琳娜”和“亚历山大一世”属于德国人）。波兰资本在采矿工业中也占有一些阵地。

在改革后的俄国，波罗的海沿岸变成了农业资本主义的主要中心之一。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土地制度的特征是：德国（波罗的海东部的）男爵的巨大地产，大批农民的丧失土地，富农——“灰色男爵”经济的迅速增长。富农从农民以及地主手中收购土地，地主为了调动资本，投入具有畜牧方向的企业经济，出售自己地产的一部分。破产的农民以沉重的条件租佃土地，或者到同一地主和富农的庄园去当雇工。

波罗的海沿岸的工业是作为全俄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发展的，同彼得堡工业地区的增长具有直接的联系。拉脱维亚资本主义工业增长得最快，特别是在 1877 年废除行会制度以后。在里加和其他一些城市中，建立了金属加工、车厢制造和化学企业（有相当多的外国资本，主要是德国的资本参加）；纺织工业增长了。有发达的铁路网把它同内陆地区联系起来的波罗的海沿岸

的大城市，同时也是俄国对外贸易中具有巨大意义的港口。

乌克兰经济的特征是资本主义“向纵深”“向广阔”发展的过程的结合。乌克兰南部——农业和工业资本主义的新地区，依靠来自乌克兰的、特别是大俄罗斯的各省居民的大量涌入而迅速发展起来。在德聂伯河流域，巨大的甜菜种植园和制糖厂属于俄国和波兰的大地主——乌克兰和犹太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大庄园和富农经济中，大规模地采用固定工人和季节工人的劳动。尽管资本主义关系比较广泛地发展，工役制仍然流行，在左岸各省（契尔尼戈夫省、波尔塔瓦省和哈尔科夫省的一部分）最为普遍。

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同乌克兰有某些相似的特征（特别是白俄罗斯西部各省，在那里，农业的资本主义体系和与之有关的酿酒工业占有优势）。摩尔达维亚同草原的乌克兰以及南高加索，是企业性谷物经济的地区；摩尔达维亚也是俄罗斯的葡萄种植业和葡萄酒酿造业的主要中心之一。

发达的资本主义同保持巨大力量的封建和宗法关系的交织，是俄罗斯帝国东方边区的决定性因素。把这些地区和省份卷入全俄的、从而也是世界的商品——资本主义经济的进步过程，具有特别痛苦的、畸形的形式。

南高加索越来越变成了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销售市场和原料基地。在 70—80 年代修筑南高加索铁路促进了这一点，到二十世纪初，这条铁路同俄国的铁路网连接起来。阿尔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河谷地区，先后布满了棉花种植园。在阿布哈兹，烟草种植业迅速发展起来。在卡赫齐亚，酿酒业扩大了。在从俄罗斯输入的廉价工厂制品竞争的影响下，地方手工业趋于衰落。甚至在山岳地区，资本主义克服了多年的隔绝状态，到处为自己的商品开辟市场。

巴库和北高加索（克罗兹尼）的最丰富的石油产地，阿尔明尼

亚的铜矿矿床，格鲁吉亚的锰矿矿床，吸引了俄罗斯和外国的资本家。不过，在改革后出现的工业中心几乎同地方市场没有联系，在落后的农业占有优势的边区，它们好像工业的绿洲。

南高加索在 1864—1871 年实行的土地改革，保留了比俄罗斯内地各省更大程度的封建主义的残余。在农村中，大土地所有者（塔瓦德、汗、别克）是主要的人物。很大一部分农民处于“临时义务者”，即依旧完成封建赋役的地位。

在中亚细亚，正如在高加索一样，俄罗斯帝国贵族上层分子的利益同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对于专制制度来说，这是重要的战略据点，是国库收入和军事殖民机关发财致富的源泉；对于资本家来说，这是新的销售市场和纺织工业的棉花基地。在十九世纪最后 15 年间，棉花种植园（主要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面积从 41,000 俄亩扩大到 356,000 俄亩；到 1900 年，向俄国中部输出的棉花将近 500 万普特。俄国的纺织公司和银行在地方封建—高利贷分子的协助下收购棉花。输出商和经纪人发了财，而棉农群众破了产，为了偿还债务，他们的财产转入收购商的手中。

中亚细亚进入全俄的资本主义体系，特别是铁路的修筑，促进了古老的、自然经济形式的崩溃，资本主义关系的成熟，城市的增长。新的民族联系代替仍然占有统治地位的氏族联系。但是，殖民制度阻碍了所有这些还只处于开始阶段的过程。

沙皇政府所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强制地阻挡了帝国内一切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但是，尽管沙皇政府的压迫，与它的意愿相反，各民族边区同大俄罗斯中部的经济的接近，具有重要的进步的后果，它们主要是：俄罗斯各民族之间日益增长的联系，他们的文化的相互丰富，先进的俄罗斯社会思想和革命民主运动对被压迫民族精神和政治发展的深刻影响，俄罗斯无产阶级和边区劳动群众的革命行动的统一的产生和发展。

俄国社会结构中的变化。地主和资产阶级 在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在俄罗斯社会的社会结构中发生了颇大的变化。

贵族阶级仍然是统治阶级，但是，不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它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清一色了。许多地主不能适应新的条件，很快花掉了赎金，出卖或者抵押自己的土地和庄园。根据土地普查资料，从 1877 年到 1905 年，贵族领地的面积减少了 25%；在十九世纪末的农业危机时期，这一过程发展得特别迅速。同时，资本主义类型的地主经济增长了，半农奴制大领地在中部地区保持了自己的主要地位。大领地的所有者是最反动的力量。沙皇行政机关的最大的代表——在地方享有巨大权力的省长和总督，以及高级军官和大臣，都是从他们中间出来的。有爵位的贵族和服公职的官僚的上层进入参议院——从农奴时代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的沙皇的谘询机关。

新的、资本主义类型的地主，是在政治方面势力比较小得多的集团。60 年代的改革所建立的地方自治局是他们的支柱，这些自治局的职权只限于地方公用事业、保健和文教方面的很少数的问题。贵族—地方自治工作者在自由反对派运动中起着主要的作用，他们企图以同执政的上层分子达成协议的方法，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改革和在专制制度的范围内为统治阶级建立代议机关。

早在农奴制度时代，俄国资产阶级就开始形成了。在改革后的几十年间，这一过程加速了。昨天的商人、包税者、粮食贸易者、发财的乡村富农和高利贷者，变成铁路、工业、银行的巨头。商工业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的极度薄弱和缺乏一种阶级组织，不适应他们的经济力量。在 60—70 年代产生的工业家的协会和代表大会（俄国南方采矿工业家代表大会委员会，铁工厂主常设谘商处，巴库石油工业家代表大会委员会等等），代表着大资产阶级个别集团或阶层的狭隘的、自私的利益。俄国的资产阶级不是革命的阶级；

在改革后时期，面临社会动荡，它竭力设法使自己得到沙皇制度及其警察、军队、官僚方面的保护。

沙皇制度虽然是贵族地主的专政，它也不得不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考虑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没有大工业和铁路，沙皇俄国就不能作为巨大的强国存在，就不能参加正在尖锐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瓜分世界的斗争。维持军队和警察—官僚机构，要求巨额的资金。从农奴制度时期继承下来的旧的收入源泉，必须用新的来补充。间接税——与工业发展有关的糖、烟草、煤油等等的消费税迅速增长了。但是，这种使广大居民群众破产的赋税的增长，赶不上支出的不断增加。从借外债找出路。俄国所欠的外债从1861年的53,700万卢布增长到1900年的396,600万卢布。沙皇制度越来越大地依附欧洲的交易所：在60—70年代——主要是柏林交易所，从80年代中期起主要依靠巴黎交易所，随着俄德关系的恶化，巴黎交易所对于俄国的意义迅速增大了。法国变成沙皇制度的银行家，也加速了两国外交联盟的形成。传统地联系着俄国宫廷和普鲁士—德国宫廷的王朝关系和君主情谊，在经济和政治斗争的坚决要求下，是必须让步的。

在国家内部，也必须考虑这些要求。沙皇政府把俄国货币资源的最大部分用于军事和行政开支以及对地主的津贴（为此，在80年代设立了专门的贵族银行），而在同时，又竭力依靠外国资本的帮助加速国家的工业发展。谢·尤·维特（1892—1903年任财政大臣）特别坚决实行的改革后的君主国的财政经济政策的基础之一，就是这样。高额关税的实施，90年代的货币改革（改用金本位），出口奖金，私营铁路公司收入的国家保证，大量支付金钱的国家订货等等，符合俄国的和在俄国落户的外国的资本家的利益。在这种“调动”资本的政策中，那些参加股份公司和银行业务的沙皇高级官吏和有爵位的贵族的自私利益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列宁这样地评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沙皇就是统治阶级即大地主阶级的首脑，这些大地主已经同大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准备用一切暴力手段来维护他们的垄断、特权和利润。”^①

俄国民族地区的有产阶级处于略有不同的情况中。不错，这里也有自己的地方特点。例如，波罗的海沿岸的男爵一向以沙皇制度为靠山，他们接近宫廷，候补高级行政官吏。一系列的波兰大地主——乌克兰的大庄园主、格鲁吉亚的王公、等等，同专制制度的联系是密切的。可是，就整个来说，被压迫民族的地主—资产阶级上层感到自己是受侮辱的。各边区资本主义的增长、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民族运动的产生创造了基础。在开始阶段，在这些运动的大多数中，领导的作用总是属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自命为“全民”利益的代表者，竭力把俄罗斯和外国的竞争者从自己的市场上排挤出去，消除发展民族语言、学校和文化的障碍，废止一些最陈腐的封建—等级制度，为自己争得政治权利和某些特权。例如，波罗的海沿岸的首先以反对德国男爵和资本家的横霸势力为目标的“青年拉脱维亚人”运动；文教协会——所谓格洛马德在乌克兰知识分子中间的活动；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阿塞拜疆的启蒙运动等等，就具有这样的性质。所有这些运动的成分都是极不一样的，除了温和自由主义分子而外，民主分子也参加到它们里去。后来，依靠具体条件、各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水平，而主要的是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的程度，划分了思想政治的界限，同时，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同封建—教权阶层形成集团，谋求同沙皇制度妥协。

工业无产阶级的形成 新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增长

^① 列宁：《关于 1905 年革命的报告》，载《列宁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43 页。